

汉语语法化演变中的 音变及音义互动关系

李小军 ◎ 著

The phonetic change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 between sound to meaning of
Chinese in grammaticalizatio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汉语语法化演变中的 音变及音义互动关系

李小军◎著

The phonetic change and interactive
relation between sound to meaning of
Chinese grammaticalizatio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语法化演变中的音变及音义互动关系 / 李小军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 - 7 - 5161 - 7908 - 6

I. ①汉… II. ①李… III. ①汉语 - 语法 - 研究 IV. ①H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309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责任校对 邓雨婷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6.75
插 页 2
字 数 438 千字
定 价 8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语法化是人类语言中普遍可见的语言演变现象。按照 Heine 和 Reh (1984) 的定义,语法化是指语言单位失去语义复杂性、语用重要性、句法自由度和语音实体性这样的一种演变。这就是说,语法化不仅体现为语言成分句法语义的演变,也涉及其语音形式的演变。实际上,现在很多语言学家主张,典型的语法化过程通常包括语用—语义、形态—句法和语音—音系三种子过程。美国语言学家 Joan Bybee (Bybee 1985, 1997, 2003; Bybee *et al.* 1994) 甚至认为,语法化过程中语言成分的意义演变和形式演变(语音演变)是高度平行的,二者之间具有直接的因果关联。她据此而提出著名的“形—义共变”(coevolution of meaning and form)假说:“语法成分的演变体现为意义和形式之间动态的共变关系(Bybee *et al.* 1994: 20)。”不过,以往的语法化研究,无论是普通语言学界还是汉学界,主要聚焦于语言成分的形态—句法和语义演变,对语言成分的语音—音系演变关注不够。国外的研究文献,管见所及,除了 Joan Bybee 的相关讨论外,系统的研究似乎只有德国语言学家 René Schiering (2006) 的博士论文《附着词化与形态演变——语法化中音系过程的跨语言研究》(Cliticiz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Morphology: A Cross-linguistic Study on Phonology in Grammaticalization)。国内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更是寥若晨星。很长一段时间,似乎只有江蓝生先生 1999 年发表的《语法化程度的语音表现》可以参考。不过,近几年来这种状况已有改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小军博士近年来利用历史文献和方言资料探讨语法化演变中的音变过程及其规律,发表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成果。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汉语语法化演变中的音变及音义互动关系》就是李小军这方面成果的一个结晶。

正如书题所显示的,作者的这项研究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汉语语

法化演变中音变过程及其方式和规律；另一是汉语语法化演变中音变和义变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两方面，应该说作者都有非常深入的观察和富有新意的发现。譬如作者通过广泛收集、整理语法化演变中的音变材料，概括出汉语语法化过程中三类基本的音变模式，即弱化、分化、强化，每类下面又再分若干小类，从而清晰地勾勒出汉语语法化演变中音变过程及其特点，大大加深了我们对汉语语法化特点的认识。

前面提到的 Joan Bybee 的“形—义共变”假说，德国语言学 Walter Bisang 视为语法化演变的普遍倾向。近年来他在多篇文章中指出，包括汉语在内的东南亚语言的语法化现象并不支持 Bybee (1994) 的“形—义共变”假说，认为“形—义不共变”（意义虚化而语音依旧）是东南亚语言语法化的一个区域特征。应该说，Bisang 教授的这一结论本也无可厚非，因为他据以立论的材料和事实，主要来自汉语历史文献以及汉语和东南亚语言的标准语。不过，假如他的视野能扩大到汉语方言的自然口语，特别是如果他能读到小军的这本《汉语语法化演变中的音变及音义互动关系》，相信他也许会修改甚至放弃上述结论。

利用汉语方言的自然语料探讨汉语语法化演变中的音变规律及音义互动关系，无疑是一个值得不断努力的研究方向。这方面的研究不仅能拓展汉语史的研究领域，也有助于提升方言研究的学术层次。进一步开展这方面研究，我以为需要着手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构建汉语方言自然口语语料库，开展基于方言自然口语语料库的汉语语法化音变研究；二是借鉴实验语音学和音系类型学的理论、方法和成果，对汉语方言中与语法化相关的音变过程进行更深入的观察、更准确的描写和更合理的解释。小军的《汉语语法化演变中的音变及音义互动关系》已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拓荒性的工作，相信他能以此为起点，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是为序。

吴福祥

2015 仲秋于京城齐贤斋

目 录

绪论	(1)
一 国外之论述	(2)
二 国内之研究	(3)
三 有关问题	(9)
四 本书框架	(12)
 第一章 语气词、词缀衍生和演变过程中的音变及音义互动	(14)
第一节 语气词衍生过程中的音变及音义互动现象	(14)
一 语气词语音弱化的判定方法	(14)
二 语音弱化和分化对语气词衍生的影响	(24)
三 关于语音强化	(30)
第二节 邵阳方言语气词“咱”、“啊”的鼻化别义	(32)
一 语气词“咱”	(32)
二 语气词“啊”	(38)
第三节 小称词(缀)衍生及演变过程中的音变及音义互动	(40)
一 后缀“儿”、“子”的形成过程	(40)
二 后缀“儿”的语音弱化及音义互动	(43)
三 后缀“子”与Z变韵Z变调	(57)
四 语音弱化中的异源同形	(62)
第四节 其他后缀形成及演变过程中的音变现象	(66)
一 名词后缀	(66)
二 动词后缀	(75)
第五节 与人称有关的前缀“阿”、“是/自”、“不”	(79)
一 “阿”	(80)

二	“是/自”	(85)
三	“不”	(89)
第六节	小结	(90)
第二章	助词衍生和演变过程中的音变及音义互动	(93)
第一节	动态助词“了 ₁ ”和事态助词“了 ₂ ”	(93)
一	关于“了 ₁ ”和“了 ₂ ”来源及形成过程的讨论	(93)
二	动词“了”与助词“了”的语音分化	(96)
三	“了 ₁ ”与“了 ₂ ”的语音分化	(98)
四	“了 ₁ ”内部的语音弱化和分化	(102)
五	“了 ₁ ”语音弱化与D变韵D变调	(106)
六	“了 ₂ ”的语音弱化和分化	(112)
七	湘赣方言“了”语音少有分化的原因	(116)
第二节	持续体助词“著(着)”、“到”、“在”等	(116)
一	有关持续体标记“着”来源及形成的讨论	(116)
二	从语音上看各类持续标记的联系与差异	(119)
三	持续体(进行体)标记“在”	(130)
第三节	“过”及其他体标记、民族语体标记音变探究	(135)
一	“过”演变过程中的音变及音义互动	(135)
二	其他趋向动词演变为动态助词过程中的音义互动	(139)
三	方言其他体标记音变情况举例	(146)
四	民族语体标记音变情况举例	(150)
第四节	汉语结构助词“的”、“个”、“得”等音变探究	(151)
一	关于“的(底)”来源的讨论	(152)
二	“底”在方言中的音变及其功能差异	(154)
三	结构助词“个”的音变现象	(162)
四	其他结构助词的音变现象	(169)
第五节	小结	(172)
第三章	数量词、代词衍生和演变过程中的音变及音义互动	(174)
第一节	与数量结构有关的语义演变及语音分化现象	(174)
一	量词的音变与义变现象	(174)

二 “个”: 从量词到指代词	(184)
第二节 “底” 不定量词用法的来源——附论“底” 不定量词、 指示代词和结构助词三者的关系	(191)
一 娄底方言的“滴” 与广州方言的“啲”	(191)
二 从方言比较看“滴” 与“啲” 的本字	(194)
三 “底” 不定量词用法的来源试析	(198)
四 “底” 不定量词、指示代词与结构助词之间的关系	(202)
第三节 汉语人称代词复数表示法的演化趋势及特征	(203)
一 五类复数标记的来源及演化	(204)
二 从标记化的角度看复数表示法的演化	(210)
三 语音弱化类型一: 减省	(212)
四 语音弱化类型二: 合音	(215)
五 复数标记的语音弱化与复标	(219)
第四节 指示代词形成及演变过程中的音变现象探究	(222)
一 有关“这”、“那”、“个” 来源及语法化过程的一些讨论 ..	(222)
二 方言中“这”、“那”、“个” 与数词或量词的合音	(226)
三 “这”、“那”、“个” 在方言中的语音分化与语义分化 ..	(229)
第五节 疑问代词形成过程中的音变现象	(234)
一 “什么”	(234)
二 “怎么” 和“咋”	(237)
三 “哪”	(240)
第六节 小结	(243)

第四章 介词、连词、副词等衍生和演变过程中的音变及

音义互动	(246)
第一节 介词衍生及演变过程中的音变情况探究	(246)
一 “把” 兼表被动和处置	(247)
二 表处所的“在”、“到” 和“的”	(250)
三 介词与人称代词的合音现象	(254)
四 介词功能悬空的句法后果	(256)
第二节 连词、话语标记的音变及结构省缩探究	(258)
一 言说义动词的话语标记化	(259)

二	“但只”及相关形式	(264)
三	“遮莫”及相关形式	(268)
第三节	副词衍生及演变过程中的音变现象	(270)
一	几个时间副词	(270)
二	其他副词音变现象举例	(278)
第四节	小结	(281)
第五章	结构省缩与词汇化和语法化	(283)
第一节	短语或跨层结构的词汇化及语法化	(283)
一	“加以”和“加之”	(284)
二	“从而”和“因而”	(291)
三	“奈何”、“无奈”和“如何”	(298)
四	“以为”和“认为”	(304)
五	“从不”和“从未”	(308)
六	“有(一)点儿”和“有些”	(315)
七	演变的三种类型	(319)
第二节	结构省缩与构式的语法化	(321)
一	结构省缩与构式的形成	(321)
二	构式“真是(的)”探究	(324)
三	构式“这/那个+人名”探究	(332)
第三节	“该”指代义的形成及泛化	(335)
一	前人之研究: 有关问题	(335)
二	“该”指代义的形成	(336)
三	“该”指代义的泛化	(343)
第四节	小结	(348)
第六章	规律及结论	(350)
第一节	语法化演变中的音变模式与方言差异	(350)
一	语音弱化	(351)
二	语音分化	(358)
三	语音强化	(361)
四	音变的方言差异	(366)

第二节 音变与义变的互动关系	(369)
一 巩固语法化演变的成果	(369)
二 加速语法化进程	(371)
三 分化语义、衍生新词	(372)
四 增强语用功能	(375)
第三节 小结	(377)
结束语 (代后记)	(378)
参考文献	(381)

绪 论

作为语言的三要素，语音、词汇、句法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在语法化演变中，三个要素是各自独立，还是相互影响、彼此互动？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在很大程度上甚至会影响到整个语言研究的方向和进展。

语音、词汇、句法三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答案不言自明。索绪尔(1916/1980: 214—225)就以“语音演化在语法上的后果”为题回答了这一问题，认为语音演化的第一个后果是割断了两个或几个要素间的语法联系，另一个后果是使过去有助于确定一个词意义的不同部分变得不能分析：整个词变成了分不开的整体。索绪尔之前和之后的许多语言学家也具体探讨过这一问题。那么语音、词汇、句法三者是如何关联、何种程度上关联？我们又该如何从它们的关联出发，更好地探寻语言的使用规律及变化规律呢？

以往研究语法化，人们多取语义与句法相结合的角度，这也是一条康庄大道。语义是内容，句法是形式，语义与句法相结合也正是内容与形式相结合。问题在于，作为语义表达的载体，语音在其中又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比如，英语中的“want to”省缩为“wanna”，汉语的动词“了[liɑu²¹⁴]”弱化为助词“了[lə]”，新几内亚 Tok Pisin 语中的“by and by”省缩为未来式词缀“bə”^①。这些不同语言中的音变现象是否存在一致的规律性，其内因又是什么？这种音变对义变又有何影响？

语法化过程中语音一直参与其中，研究语法化如果抛开语音层面或者对语音层面关注不够，那么对语法化的全面、深入了解很可能只是镜花水月。高兴的是，近几十年来，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语法化演变中的音变

① by and by 借自英语，具体音变过程为：by and by > baimbai > bai > bə。

现象一直为大家所关注,一些基本观点也为学界所认可。

一 国外之论述

语义及句法演变导致语音变化方面,近几十年来国外研究语法化的学者谈得最多的是语音弱化。Givón (1975: 96) 就说道:“当一个动词失去大多数语义内容变成一个格标记时,它就立即失去音系实体,变成一个黏着词缀,并且最终完全被销蚀(eroded)成零形式。”同时认为,“一个话语信息的最主要的组成成分,被托付给一个弱化的语素,这种情形是不可能的。而且在语言中,一个因损耗而发生的演变过程是一种可预测的演变,但它的反面——丰富或者增加——是不可预测的”。进而 Givón (1979: 209) 根据他的“章法成分句法化”和“句法成分词法化”思想,提出一个语法化演变的循环模式:章法成分(discourse) > 句法成分(syntax) > 词法成分(morphology) > 形态音位成分(morphonemics) > 零形式(zerō) > 章法成分。这不由使人联想起语言类型学上的循环说,即分析型转化为综合型,又转化为屈折型,最后又向分析型转化。^① DeLancey (1985) 也指出,循环演变在藏缅语族中相当普遍。^②

Lehmann (1983: 339—378) 将各种语法格排列成一个虚化等级(自左向右由低到高):工具/伴随/方位 > 处所 > 与格 > 宾格/作格/领格 > 主格/通格,并把语法格的各种表现形式也排列成一个等级,语法化程度越高就越倾向于采用形尾(词缀)和零形式:词汇形式(> 副词) > 介词 > 词缀/形尾 > 零形式。Haspelmath (1999) 则依据“无形手理论(the

① 当然,某些语法形式的变化并不一定就导致整个语言类型的转变。比如,李永燧(2002)对藏缅语族进行了考察,发现黏着式是否转变为屈折式,受整个语言音变规律的制约,而不是按照语法范畴独立地进行。这意味着黏着型语言有可能演变为屈折型语言,但也未必如此,因为词缀的消失不一定在词根上以屈折的形式反映出来。例如,使动前缀“*s-”,有的语言消失后在部分词中转换为词根内部屈折变化形式(如浊音—清音,不送气音—送气音等),有的语言如哈尼语、毕苏语、桑孔语等则没有这种补偿形式。某些语法形式可能确实经历了从分析式到屈折形态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对整个语言系统的影响可能是轻微的,即不足以导致语言类型的变化。比如,汉语人称代词复数标记、结构助词、体标记等在很多方言中都从附加型演变为屈折型(先是语音弱化,进而合音),但是汉语并没有从分析型演变为屈折型。

② 如我国境内的拉祜语中“来”义的“la”本是个独立动词,后来变为半独立的动词,相当于“跑来跑去”中的“来”,然后又变为轻声词缀“la”,最后又缩略为前一音节的韵尾“-l”,如“wal”(<wa+la)。

invisible-hand theory) ”对语法化的单向性提出了解释: “语法化是铺张 (extravagance) 准则的一个副产品, 这就是说, 说话人使用异常明确的表达式以吸引注意。因为这种异常明确的表达式被言语社团广泛采用, 它们的使用就变得更为频繁, 音系形式随之而发生弱化。”不过 Haspelmath 的不足是认为音系形式的弱化完全是由频率而非意义驱动的, 这与大部分学者意见相左, 比如, John Haiman (1985/2009: 140—147) 就以反身与交互 (reciprocal) 形式的缩减为例, 认为语音弱化是由意义驱动的。

Hopper and Traugott (1993/2008: 133、195) 也认为语法化演变单向性的另一种表现是, 语法化沿着某一结构属性的路径或斜坡从形态上 “较重” 的单位扩展到 “较轻” 的单位中, 即从语音上往往是较长和较清晰 (例如带有重读元音) 的单位扩展到往往是不太清晰和较短的单位。词汇项与附着形式经过典型的形态化融合为词干和词缀的过程, 伴随着各种语音变化。这些变化通常被描写为缩减: 元音和辅音脱落, 强调或重读语调的丧失导致新词重音重新调整, 相邻音段之间彼此同化。并认为在伴随形态化的语音磨损和选择过程中有两种趋势: (1) 量 (组合) 的缩减: 随着音位的损耗, 由它们所构成的形式也在变得更短; (2) 质 (聚合) 的缩减: 这个形式里残存的音段是从逐渐缩短的集合里提取出来的。据此, Hopper and Traugott 提出一个语法化演变模式: 实义词 > 语法词 > 附着词 > 曲折词缀。

Heine and Kuteva (2002/2012: 2) 也认为语法化包含四个相互关联的机制: (1) 去语义化 (desemanticization) —— 意义内容的丧失; (2) 扩展 (extension) —— 推广到新的语境; (3) 去范畴化 (decategorialization) —— 语法化了的词汇形式逐渐丧失原有的形态句法属性; (4) 销蚀 (erosion) —— 语音实体的磨损。同时该书还提供了大量不同语言的语音弱化例。

实际上, 目前在外国语法化学界, 语音弱化已经被视为语法化过程中的一个基本规律而不言自明, 他们认为一个典型的语法化过程往往包括 “语义—语用”、“形态—句法” 和 “语音—音系” 三个子过程。

二 国内之研究

关于语法化演变导致语音弱化这方面, 国内也有很多论述。这里先简单谈谈民族语或汉藏语系语言的研究, 后面重点介绍汉语学界当前的

研究。

瞿霭堂(1995)指出汉藏语系的虚词语音弱化规律是:“与实词的形式相比,往往又具有一定的依附性,如常常轻读,有时声调变得模糊,发生减缩变化等,这是与形态成分相似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瞿文还讨论了汉藏语系语言虚词与前接语言单位组合的三种方式:(1)化合,虚词的声韵母,特别是声母要随前接语言单位的语音特别是韵尾发生变化,这是同化或增音的共时语音变化;(2)黏合,虚词本身或虚词的部分语音与前接语言单位合为一体,成为前接单位韵母的一部分;(3)溶合,虚词本身消失,但使前接语言单位发生语音变化,与黏合方式的不同在于黏合的虚词实体(至少部分实体)存在,而溶合的虚词实体完全消失,只留下影响。孙宏开(1992、1995)在讨论藏缅语语法结构类型的演变、格范畴的形成等问题时多涉及音变;李永燧(2002)研究藏缅语族时也发现,一部分黏着形式是由词的形式虚化而来。

在单个语言方面,也有不少优秀的论述。比如,戴庆厦(1996、2007、2009)对景颇语词汇化和语法化进行了深入分析,发现景颇语中虚词语音形式的变化,有的是音节简化,有的是元音弱化,同时认为虚词的语音变化,具有促进和巩固语义虚化的作用。

吴启禄(1996)讨论了布依语动词的虚化,认为可分为词义虚化和词性虚化两种。词性虚化使实词性的动词成为副词、助词、连词等虚词,甚至成为合成词的词缀。周国炎(2009)发现布依语完成体助词也都源于动词的虚化,演变路径与汉语非常相似,同时语音也常常弱化。弱化表现为两个方面:声调轻声化,韵母音系形式缩短并进一步央元音化。张定京(2005)对哈萨克语虚词来源的分析多涉及语音弱化与变化;石德宽(2006)讨论了卑南语的中缀和后缀,发现其中也多有语音弱化现象。再如梅广(1996)对独龙语句尾词的研究、符昌忠(2006)对村语动词虚化的研究、李炳泽(1999)对瑶语前缀的研究、朱文旭/方虹(1999)对彝语使动词缀的研究、陈国庆(1999)对柬埔寨语低语词缀的研究、陈国庆(2010)孟高棉语前缀的研究、哈斯巴特尔(1991、2007)对蒙古语复数词缀的研究等。

当然,目前对民族语虚词(词缀)衍生过程中语音变化的讨论,主要侧重于探讨语源,大多数研究也没有纳入语法化这一框架中,因而规律的探讨非常不够。

关于汉语语音弱化的论述就比较多了。早在1978年,李荣就深入分析了温岭方言的各种音变情况,指出本音和变音之间是语法变化的关系,是构词手段。^①当然,其中的音变不一定是语法化导致的,也不一定是语音弱化。大致来说,汉语方面有关语法化演变中语音变化现象的论述侧重于如下三个方面。

(一) 将语音弱化作为语法化演变的旁证或语法化程度的表现

这方面较典型的代表是江蓝生(1999a)。江文以“着(著)”为例,对语法化程度的语音表现进行了极有价值的探讨,发现方言中“著”语音弱化的特征为:(1)韵母央化;(2)声母由舌上变舌头,少数地方由舌上或舌头音变为边音;(3)声母脱落,只剩下央元音。并将“着”的语音弱化与语义变化结合起来,认为这一演变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着”在“V+着+NL”中做动词V的补语,同时引出动作的处所,开始虚化为介词;语音上主要是轻声,在第一阶段后期“着”韵母央元音化,有些地方声母也开始由舌上向舌尖前移,如[tʂuaʔ]/[tʂəʔ]/[tʂua]/[tʂə]/[tʂə]/[tʂʌ]。第二阶段主要表现为声母由舌上变为舌头(少数地方变为边音),如[tiaʔ]/[təʔ]/[tia]/[tə]/[la]/[lei]。第三阶段,X成分对动词的附着性增强,其介词性大大减弱,发展到后来更像是动词的后缀;语音形式简化到只剩下一个央元音,如[ə]。第四阶段,X成分虚化的程度更深,在形式上跟动词融为一体,已经失去了独立的音节位置,只靠动词加重加长读音来表示,进一步发展还出现了零形式。

汉语学界对后缀“儿”的研究非常多,最早对“儿”缀进行系统探源的是王力(1958/1980:223—228)和太田辰夫(1958/2003:85—90),不过他们关注的焦点是语义变化。此后李思敬(1986)将语义和语音相结合对“儿”缀进行了深入讨论,认为儿化音至少在17世纪初已经出现,此外还讨论了一些异源儿化现象。王福堂(1999)、王洪君(1999/2008)两本专著都花了很多篇幅讨论后缀“儿”及Z变韵现象,包含很多有价值的观点。比如,王福堂认为儿化韵的消失是必然趋势,原因在于小称义的磨损,这和汉语的语素及音节规律有关。王洪君则认为目前所见的Z变韵,参与变韵的后缀不一定是“子”,因为其中缺少一些演

^① 具体论述参李荣《温岭方言的变音》,《中国语文》1978年第2期。

变环节。在小称词和儿化变韵变调方面还有很多深入的论述,如徐通锵(1981)、郑张尚芳(1980、1981)、董绍克(1985)、俞敏(1987)、尉迟治平(1989)、颜森(1989)、谢留文(1991)、陈忠敏(1992)、方松熹(1993)、黄群建(1993)、邢向东(1996)、赵日新(1999, 2007)、李思敬(2000)、沈明(2003)、蒋骥骋(2004)、邵宜(2006)、吴芳/伍巍(2009)、曹志耘(2011)、郑丹(2012)等。目前的一些材料显示,参与变韵变调的后缀很可能是“儿”不是“子”。

其他再如方梅(2002)对北京话“这/那”的分析、邢向东(2006)对陕北神木话的准语气词“是”演变的论述、王彦(2007)和王文卿(2009)对山东和山西地名中“家”语音弱化的讨论、李小军(2012a)对邵阳方言语气词“咱”和“啊”鼻化别义的分析等。

语音弱化有时会导致复标,这方面陆陆续续也有一些较好的研究。如,王海棻(1991)讨论了六朝以来的叠床架屋现象,刘丹青(2001)讨论了语法化演变中的强化与叠加,曹广顺(2004)讨论了语法化过程中新旧形式共存并最后择一的规律。张谊生(2012)则具体探讨了叠加、强化的方式、类型和后果。

(二) 利用音变探源

这方面研究比较多。代词方面吕叔湘(1985)最具权威,对“们”、“这/那”、“这么/那么”、“哪”、“怎么”、“早晚”等的分析十分深入。再如冯春田(2000、2003、2006a、2006b、2008a、2008b、2009、2010)对疑问代词来源的系列研究,多以音变、结构省缩为线索,很有价值。值得注意的是冯春田(2009)还总结了疑问代词形成的基本规律及路径:(1)底:何等>等(又复合为“云等”)>底(音变);(2)勿:何物(何勿)>勿/没(莽)……音变;(3)什/甚:是物(勿)/拾没/什摩/甚摩>什/甚(音变);(4)作/怎:作物(勿)/作没(摩)/怎麽>作(生)/怎(生)(音变);(5)那(反诘疑问):奈何>奈>那(哪,音变);(6)若(询问方式):若何>若(又复合为“若为”)>那(复合为“云那”);(7)如(询问方式):如何>如。

江蓝生(1995)利用音变材料提出人称代词复数标记“们”源于“物”;江蓝生(1998)认为元代以来的后置词“行”不是蒙古语格助词的译词,而是“上”白读音的变音。张惠英也多利用音变来探讨语源。如张惠英(1993)认为山西方言的远指代词“兀”本字是“个”,张惠

英(2000a)认为山西、陕西、河南方言中普遍存在的词头“圪”与“阿”是同一个来源——也是量词“个”；张惠英(2000b: 104—107)则认为闽南话中做量词、助词的阳平调的“兮[e²⁴]”是“个”失落声母所致，并推测了“个”到“嘢[iE²³]”和“兮[e²⁴]”的具体音变过程。再如张惠英(2010a)认为北京土话中读作“汉[xan⁵¹]”的并列连词(介词)，本字是“喊”；张双庆、张惠英(2002)认为《史记》中很多人名中的“不”字(如“吕不韦”、“申不害”等)和南方少数民族语言的词头“布”来源相同，都来自表示男性的“父(夫、甫)”。

再如戴昭铭(2000)对吴方言人称代词复数标记演变(音变)的研究很有意思，其他学者探讨人称代词复数标记时也多涉及音变，如赵元任(1935/1956)、钱乃荣(1999a)、李如龙(1999)、梅祖麟(2004)、汪化云(2008)、史秀菊(2010)等。

在助词方面，罗自群(2006)利用音变材料，将汉语方言中表持续的助词都归为“着”，某些说法虽然值得商榷^①，但其中仍包含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观点。再如林焘(1957)对补语标记“得”的轻音分析，彭逢澍(1999)对湘赣方言中表完成的“呱/嘎”的研究等。与动态助词相关的D变韵和D变调也有很多深入的论述，如前面提到的李思敬(1986)、王福堂(1999)、王洪君(2003)，再如张成材(1958)、贺巍(1982、1992)、赵清治(1998)、王森(1998)、董绍克(2005)、史有为(2005)、辛永芬(2006b)、温昌衍(2006)、刘雪霞(2006)、曹牧春(2007)、艾红娟(2008)等。不过他们的意见基本一致，即都认为这是动词与动态助词合音的结果。有意思的是，历时层面的音变(省缩、合音)有时会表现为共时平面的屈折，在其性质的认定上学界也曾有过一些争论，这可以参阅刘丹青(2009b)。结构助词方面也有很多优秀的论文，如项梦冰(2001a、2001b)对客家话结构助词“个”的音变分析、李如龙(2001)对闽南话“个”的分析、张惠英(2010b)对“个”、“底”的分析等。

(三) 探讨语法化演变中的音变规律

这方面吴福祥(2003、2005a)主要分析语法化演变的单向性、汉语

^① 比如李蓝(1998)、吴福祥(2002)和李小华(2007)就认为持续标记“倒/到”源于“到达”义动词“到”。